

九十二年前西安围城背后的刀光剑影

北洋时期,中国总体处于四分五裂的无政府状态。在弱肉强食的乱局中,枪杆子就是硬道理,匪如蚁生,军阀四起;兵为大匪,匪为小兵,兵匪难分。当时关中地方匪患严重,其中最大两个土匪是麻老九和党拐子,分别割据东西两府,自成一体。麻老九原名麻振武,党拐子原名党玉琨,二人均出自陕西靖国军。

1917年,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,试图推翻北洋中央政府。郭坚以此为借口,成立陕西靖国军,自任司令,“为国除奸”。1921年,郭坚被杀,靖国军从此分化、解散。麻老九和党拐子当时均为靖国军支队长,就此走上退守一方的土匪生涯。

关中刀客

所谓靖国军,其实就是由一群刀客组成的军队。刀客可被视为关中地方一种特殊的社会产物。关中“民情质实,悍而不流于狡”,性刚好斗,又尚公近义。虽然会因为“尺布斗粟,辄兴雀角,但一闻公家之令,即争先恐后,虽困重未敢稍违”。这种风气,几乎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的农战传统和游侠作风,亦如明代王阳明所言:“关中自古多豪杰。”

近代刀客的兴起,则与晚清时期的关中战乱有密切关系。道光初年,刀客已成为关中一种令人关注的社会现象。这些人主要活动在东府一带,随身带着一三尺长的关山刀子,后来逐渐发展到带枪。刀客既为“客”,既没有固定居所,也没有固定职业;或替人寻仇,或保运押解,或设赌械斗。在官方和士绅阶层眼中,这些“刀匪”与“会匪”一样,都是“地方大害”。1846年,结束流放的林则徐被任命为陕西巡抚。他甫一到任,便将刀客问题列为“首务”,决心“除暴安良”。然而跟鸦片问题一样,刀客问题也不是林则徐一人可以解决的。1849年,新上任的陕西巡抚张祥河再次捕拿刀客。可是不久之后,刀客在同治回民变中再次发展壮大。从光绪、宣统到民国初期,中国社会发生巨变,大量刀客通过进入军队实现了身份“洗白”,成为主宰关中和陕西社会的精英力量。

晚清到民国,厘金制度使民众不堪盘剥,刀客一度成为农民和商人抗税的不二选择。光宣年间,朝邑刀客王振乾外号“王狮子”,依靠护运商货而声名远播。他所运的盐、茶、鸦片等货物,闯关关卡,偷税漏税,官方恨之人骨,莫可奈何,民间却尊称其为“王先生”。

随着南方辛亥革命爆发,关中刀客也有所行动。劫富济贫的刀客被称为“渭北十八娃”。朝邑刀客严孝全率众参加了西安的革命起义,在战事中阵亡。后来郭坚集结刀客,树“靖国军”旗帜,纵横渭南河北及关中全部地区,“电掣雷轰,骁勇绝伦”。虽然其“正义之处,颇为进步人士所推重”,但作为传统时代的产物,刀客与现代军人存在明显距离。郭坚本人“刚愎自用,任性而好杀”,其部下亦毫无军纪可言,“部伍所至,掳掠绑票,怨声载道”。郭坚最终被陕西督军冯玉祥以“渭门宴”设计暗杀。

西安围城

1926年2月至11月,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“西安围城”,这也是杨虎城与李虎臣的守土之战。

曾统治陕西长达八年的河南镇嵩军司令刘镇华,在吴佩孚的支持下,以“打到西安

去升官发财”的口号召集了十万乌合之众,围攻西安城,十余月终不能下。这期间,刘镇华分兵进攻咸阳、三原、泾阳、高陵诸县,烧杀抢夺,奸淫掳掠,拉了征夫,无恶不作;所到之处,十室九空,导致数十万关中平民流离失所。

当时,被困在西安城内的十余万军民更是饥寒交迫,仅以麸糠、油渣、树皮果腹,甚至将牛皮制品煮了充饥,前后长达八九个月之久。其间,饿、病、冻,战死的军民有五万多。由于不得出城安葬,只好在皇城东北角的空地上掘得两个“万人坑”,将死者草草掩埋。处此绝境,几乎每天都有死尸抬来,有时甚至上百。因为没有棺槨,坑小尸多,不得不层层叠压,情状甚为凄惨。

当时守城的陕军不足万人,杨虎城、李虎臣率全城军民坚守;攻城的镇嵩军多达七万,且有吴佩孚、阎锡山给予的大量补给和支援。十面围城的西安城内,储备的粮食极其有限。刘镇华为了加重守城的压力,阻止一切城内仇民外逃,对所有从城内逃出来的人格杀勿论。后冯玉祥遣孙良诚部援陕,西安始得以解围。西安解围后,古城内外破坏严重,昔日还算繁华的街道一片瓦砾,满目疮痍。而死亡的五万之众,几乎占当时城内人口的一半,可谓万户萧疏,人影零落。西安各界,人人背土,填平万人坑,堆起两个墓冢,名为“负土冢”。两家之间,建“革命亭”一座,并将该处辟为公园,命名为“革命公园”。

次年春,西安市民在“革命亭”举行大祭,追悼死难军民。杨虎城手书一联:“生也千古,死也千古;功满三秦,怨满三秦。”此联道出杨的痛苦与不安:庆幸守城成功,西安未遭屠城之灾;自责军力单薄,未将来犯之敌击溃,招致军民死伤惨重,城池毁坏,民怨满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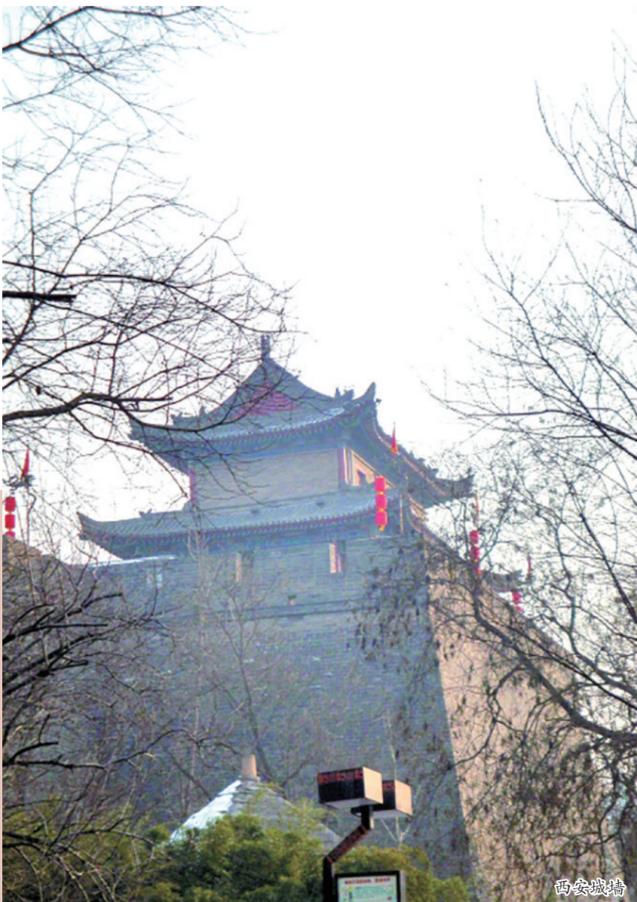
西安兵败后,近乎解体的镇嵩军狼奔豕突,沿西安至潼关的大道向东溃退,互相践踏,途为之塞。刘镇华重新统治陕西的梦想破灭,只得前往开封投靠当年的拜拜兄弟冯玉祥。在陕西人一片“杀刘”的诅咒声中,冯玉祥不顾众怒,反而将刘镇华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八方面军司令。西安解围后,杨虎城率部撤离西安,不久便被冯玉祥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路军总司令,竟与死对头刘镇华成了“战友”。

冯玉祥从1926年在五原誓师后,取道陕甘开始北伐。在此后两年,冯玉祥陆续消灭了陕西境内靖国军的残余各部势力,其中以围剿麻老九和党拐子的战事最为惨烈。

东府麻老九

靖国军解体后,麻老九一度归附刘镇华。1925年,麻老九联手吴佩孚据守潼关,使国民军的第二、联军几乎全军覆没。翌年,麻老九随刘镇华围攻西安。西安围解,刘镇华逃回河南,麻老九则率部窜回同州老巢,被冯玉祥派出的第五军跟踪追击,围困起来。两月后,方部奉命东调北伐,围攻同州的任务改由韩复榘的第八军接替。

麻老九原籍商州,幼时随父逃荒,落户于渭南孝义镇赵家崖。少年时与陈家滩王英亭(老八)等结为异性兄弟,麻排行第九,故称“麻老九”。宣统年间,麻老九见世道崩乱,意欲起事,听说大地主武善人正在招雇



西安城墙

长工,就前去应聘。武善人看麻老九身体强壮,就问工价几何。麻老九说:“我要求不多,一年八石高粱,不过是先给工钱。”因为工价较低,武善人就答应了,先给了他八石高粱。麻老九如法炮制,连续应聘了八家大地主。不几日,麻老九召集这些“东家”们,来他家见面。麻老九掏出一把“二十一响”(手枪),对这些地主说:“这是你们给我的工钱,我麻老九要造反起义,非常感谢你们资助我,我将永远不会忘了你们的大恩。”这几个地主吓得目瞪口呆,麻老九就靠着这把枪拉起杆子,成为远近闻名的悍匪,并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:振武。

麻老九纵横关中十余年,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。麻老九最擅长绑票、撕票和破围子,这是他的谋财手段。如果哪个村庄抵抗,不让他烧杀抢,那他突破“围子”(村庄的寨墙)后,必定鸡犬不留。

同州是关中一座历史名城,又是东路重镇,城坚池深,地势险要。麻老九将同州据为巢穴多年。同州毗邻山西,麻老九就近勾结阎锡山,以其搜刮来的大量民脂民膏,从山西换来各式弹药武器,城内的粮弹储备异常充足,无虞匮乏。

韩复榘率部围攻同州近两月,也未能攻克。由于北伐战事吃紧,韩部不久亦奉命东调,乃以第二军刘汝明部继续围攻。刘又攻打了两个来月,损折了不少人马,还是攻打不下。

1927年夏,冯玉祥又加派新由甘肃天水调来的第十三军,增强围攻同州的兵力;并以该军军长张维玺为同州攻围军总司令,刘汝明为副司令,限令一个月之内攻克,逾期以军法从事。用两个军、四五万人的精锐之师,来收拾一个旅、五六千人的土著队伍,可见麻老九之强悍。从7月初开始,昼夜猛攻,炮火连天,伤亡数以千计。但是一月限期已过,而始终未能攻克,张、刘二将受到革职留任、戴罪立功的处分。张鉴于硬攻无效,乃决计改掘坑道从地下进攻,在坑道上填炸药引引爆,将北城墙炸开豁口,冲锋部队突入城内。毕竟众寡悬殊,巷战进行了约一小时内,麻部5000余众全部战死或被俘。麻老九本人乔装为难民,企图混出城去,结果走到同州东南的仓头铺就被认出。刘汝明部赶到射击,麻老九身中四枪而死。

同州城克复后,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陕

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,当时正驻守固原,督战剿匪。宋哲元急电张维玺,请他把负隅守城的麻部俘虏3000人全数斩尽杀绝,以儆效尤,冀使其他土著军阀闻风丧胆,知所畏惧,不敢再有守城抗拒的举动。张维玺为人敦厚,不忍杀戮,反而将俘虏全数释放,并发给盘缠,令其各回家乡,另谋生路。

西府党拐子

西安解围后,冯玉祥任命手下五虎上将之一的宋哲元为陕西省主席兼剿匪总司令。宋哲元欲以武力统一陕境,在攻克东府大荔后,于1928年进军西府。

当时北伐战事正紧,陕西境内的第二军刘汝明部和张维玺部陆续东调,留在陕西境内的宋哲元部肃清陕西各地抗不听话的土著军阀队伍。关中战事趋于平息,仅余西府残余势力,而其中最为坚硬者就是凤翔的党拐子。

凤翔也和同州一样,自古以来是一座地标性的著名城池,是关中西路的重镇。凤翔城内地势远远高于城外,城墙既高且厚,坚固异常,城壕深宽各在三丈开外。自1917年开始,党拐子盘踞凤翔整整12年,不论谁来担任陕西省的军政首领,一切军令和政令,他概不听从,实则是关中西府的土皇帝。党拐子以铁血重典统治西府,曾说:“凤翔人两条路可走,或者规规矩矩地听命于我,或者永远远离凤翔。”他的重典就是嗜杀:抢劫者杀、偷盗者杀、告状者杀、抽烟者杀、打牌者杀……

讽刺的是,熟读三国的党拐子常自比诸葛亮,“苟全性命于乱世,不求闻达于诸侯”。在凤翔这个小王国境内,他还首创了证件制度,人们必须有五证:居民证、出门证、通行证、乞丐证和营业证。和那一时期的普遍状况一样,党拐子的手下与其说是军队,实则是土匪,纪律废弛,苛索强横,杀人越货,横行一方,民无

宁日。加上党玉琨本人鸦片烟瘾特别大,烟、酒、嫖、赌,恶习俱全。党拐子还是与孙殿英、靳云鹗齐名的民国三大盗墓贼之一。党拐子统治西府时期,大肆盗掘西府一带古墓葬,窃掠了大量自先秦至汉唐的珍贵文物,走私出外,以供其挥霍和扩充武装实力。

与麻老九助攻刘镇华不同,党拐子也曾参加西安攻防战,却是守城一方。西安解围后,党拐子抗拒冯玉祥的命令,继续占据西府。1928年初,宋哲元亲自督率所部三个师和一个旅围攻凤翔城。

党拐子在凤翔苦心经营,把这座城池当作他的万世家业,城内的囤粮可供城内驻军和居民三年食用,武器弹药也十分充足。宋哲元动用了三万多兵力,自春至夏,围攻达半年之久,伤亡达四五千人,却始终未能打开凤翔城。

7月间,北伐战争已经告一段落,宋哲元经过请示冯玉祥,把远在山东和河南的张维玺所部第十三军主力调回陕西。8月初,张维玺率全军三万多人,由西安开到凤翔东郊,参加攻城之战。

张维玺基于上年攻打同州的惨痛教训,乃决计立即采取挖掘坑道从地下进攻的战术。花费近半个月的时间,坑道顺利挖到城脚之下,里面埋藏了近4000公斤的炸药,并接上了电线。宋哲元亲自指挥总攻,按下炸药电钮,随着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,城墙被炸开二十丈宽的大豁口。爆破的同时,枪炮齐发,炮声、枪声、号声和喊杀声震耳欲聋。城内的守军惊慌失措,完全陷入瘫痪状态。攻城部队像潮水一般涌进城去。巷战不到一个小时,即告全部结束。

自比诸葛亮的党拐子本人,在乱军中被击毙,城内守军被打死、打伤约2000人左右,其余5000多人被俘。城内居民葬身在炮火之下的,约在万数以上。触目所及皆是死尸和满身血污的伤者,城内的房屋大部分都成了焦土废墟。

凤翔杀戮

攻克凤翔后的第三天,在宋哲元的强力说服下,张维玺接受了屠杀令。被生擒的党拐子手下5000名俘虏,将被全部处决。

这种大规模的杀俘行为,在近代史上极为罕见。当时狼烟四起,匪患蜂聚,中国刚刚走出皇权专制时代,离现代文明依然遥远,军队与国家的关系很模糊,军人与土匪几乎没有多大的区别,当然也无什么军事法庭和人权意识。毕竟这是一个暴力野蛮的时代,几乎难以奢谈现代文明。颇有讽刺意味的是,这场处决或者屠戮,被安排在凤翔城东八里纸坊镇东头的一座关帝庙前。宋哲元与张维玺坐在关帝庙门口,下令对拘押的500名俘虏开刀。

这场骇人听闻的集体大杀戮,很快传遍了陕西全境。在这种砍头如割韭菜的暴力震慑下,仍然盘踞各地的武装势力,惶惶不可终日,不几日就纷纷单骑来降。宋哲元的血腥暴力,居然使兵刃四起的关中从此走向平定,各种土著军阀和土匪势力陆续肃清。

宋哲元主政陕西期间,取消斗捐,以恤民艰。1929年关中干旱,遭遇年饥,粮价暴涨,特由陕西省筹款30万,再由河南省接济30万,汇往汉口,买米十万石赈灾。关中灾祸数十载,至此方告一段落。 □ 杜君立

往事



杨虎城与李虎臣的“二虎部队”守长安。

Sha

为什么印名片? 验明正身,自我推销。彼此见面后,会议开始前,序幕的序幕是交换名片,名片大战。这时候,全场最活跃,气氛最热烈;这时候,只有这个时候,才是那些最爱出风头、最爱拉关系的人撞大运的好时机。要是名人遇到大官,或者大官遇见名人,气氛还要热烈。“您就是大名鼎鼎的□□同志?”惊叫之声不绝于耳。只见名片飞舞,笑声大作,或拍肩抚背,或交颈拥抱,或抓住对方的手臂乱摇晃,攥得人手臂疼疼的,摇摇人胳膊快要散架。

这无疑是名气和职位的大竞赛,实力与派头的大联展。人家当官的,名片反倒素雅,一个官衔说明了身份,无需丝丝缕缕摆炫耀,倒是

一伙舞文弄墨的不敬惜油墨,过分堆砌,什么“长”、什么“事”、什么“员”、什么“问”一大串,把粉全擦在脸上,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个人物。

有张名片,把自己的头衔分为“短期的”“长久的”“任命的”“挂职的”“代理的”“授予的”“表彰的”凡七类,文武乱乱不挡,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,一专多能,人才难得,过目不忘。

有张名片,一共十个头衔,第一个头衔就是: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”。有张名片:“……教授(相当于一级作家)”。有张名片:“……副主编(没有主编,正局级待遇)”。有张名片:“著名文艺批评家”。我想起一件事来。某年某月,在中原某

沙氏的幽默

名城某个像样的宾馆,我们“编审”一行数人登房。验票工作证后,服务人员问:“你们住三人间还是四人间?”我们回答说:“住两人间。”服务员故作鄙夷状,说:“两人间的没了。”我们指着一楼空荡荡的房间质问道:“那不是吗?”服务员觉得可笑,不无揶揄地说:“那是给科长留的!”

“三代以下,未有不好名者”,“不在乎天长地久,只在乎曾经拥有”,所以,对于在名片上加注级别待遇什么的,我很理解,刻意包装嘛!

开幕式后,餐厅的路上,邵君燕祥递给我一张名片,说:“我的电话有变动,留个电话号码给你。”我接过来一看,颇为吃惊,名片上留白很多,除去三个字的大名以外,就是下面一行

小字——住址和电话。

他的名片上什么头衔也没有,可是文坛无人不识君: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,诗人兼杂文家。这类名片是无字碑,什么都没有,什么都有了。广东省作协主席陈国凯,送人的也是空头名片,没有头衔。

巴金出国,作协给他印名片,各种头衔耀人眼目:政协什么,作协什么,上海什么,最后是“小说家”三个字。巴老感叹:“小说家才是首要的,没有小说家三个字,哪来的其他什么?”

还有更绝的,名片上的头衔倒是有的:“我,沙叶新。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——暂时的;剧作家——永久的;某某理事、某某教授、某某顾问、某某副主席——都是挂名的。”又有张名片,生怕别人忽略自己,折叠式

的,篇幅大,加印上发表作品的详细目录,还有获奖作品的目录。名片的四个版面密密麻麻,而我们,都到了不戴老花镜就成了“睁眼瞎”的年龄,如此名片,上面什么都有,什么都没有。

日前,中国清辞文坛“资深教授”第一人的章开沅,接受《新京报》访问时说,他曾经收到北京一位教授的名片,只印了六个字:“退休金领取者”,奇人啊!他请辞(同于院士丰厚待遇的)“资深教授”后,也以“退休金领取者”自居。

有诗为证:“丈夫所贵在肝胆,斗大虚名值几钱?” □ 阎纲

视点